



字中获得，或者则是耳闻。

1938年3月11日，15岁的少年盛峻峰看到一则报纸广告，流亡上海的俄侨苏依柯娃，为谋生创办了俄语学习班。盛峻峰依照广告上所登载的地址，找到了位于南昌路上的苏依托娃的住处。他按动着门铃，实际上也按动了一生的功业与机缘。开门的中年妇女正是苏依托娃：“小孩，你来干吗？”

“我要学俄语！”盛峻峰回答道。而苏依托娃报出了每小时一块钱的高价。在当时一般人的工资不过每月二三十块钱的年代，盛峻峰每个月能从父亲这儿得到五块钱的零花钱。他决定每星期去苏依托娃那学一次俄语，也在苏依托娃的指导下购买了《俄文津梁》。渐渐地，草婴感觉“吃不饱”，又去位于虹口的内山书店购买了《露和辞典》——所谓“露”，是日文翻译“俄罗斯”的首字；所谓“和”，当然指的是日本。那时候的日文中比如今夹杂更多汉字，也令没有学习过日语的少年盛峻峰得以借助其中的汉字间接地学习俄语。之后，在地

下党员姜椿芳教导下，盛峻峰的俄语水平突飞猛进。

短短两年多以后，盛峻峰就开始翻译苏联作家普拉东诺夫的《老人》。1942年，这篇译作发表在当时上海出版的《苏联文艺》月刊上。译者署名：草婴。在日寇占领之下的上海，这样一个笔名当然可以一定程度上不那么突显译者本人是谁。而盛峻峰之所以取了这么一个笔名，是应和了唐人白居易的千古名作——“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说：“草婴，就是比小草还要小的意思。我觉得自己很平凡很渺小，好像一棵小草，火烧也好，被人踩也好，但我不会随便屈服，有了条件我还是会重新长出来。”

自此以后，一发而不可收。上

世纪50年代翻译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60年代翻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及至70年代选择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

在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时，安娜的命运时常使他深陷其中。学生章海陵记得，有一天自己上门拜访，发现老师有些异样。他起身告辞，草婴一再挽留。过了一会儿，草婴动容地说：“安娜死了……我刚才在翻译‘安娜之死’，心里难过。”

草婴是让安娜为中国人熟知的译者。在盛姗姗看来，中国之所以有一大批人对俄罗斯文学如此钟爱，有着不少原因。比如，中国有不少人是很喜欢看书的，读书人很多，也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中国与俄罗斯在某些发展阶段，国情有相似之处。”盛姗姗说，“在过往的岁月中，俄国乡村是采取木犁耕地的，中国乡村亦然。在托尔斯泰生活的年代，俄国也向往西方，希望学习西方，让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而中国同样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也有一个向西方学习，又经历失败，又不屈于失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苏俄文学映入中国人的眼帘。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许多心态，特别是当年知识界人士的许多心态，与俄罗斯是相通的。”在美国生活、工作多年的盛姗姗更发觉，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在全球范围内来说也堪称受众巨大，还有著有《静静的顿河》的米哈依尔·肖洛霍夫，是196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西方，肖洛霍夫仍有不少读者。“这证明了俄罗斯文学其实是比较强大的，对世界文学有重要影响。”盛姗姗说。



上图：《战争与和平》校样。



左图：《战争与和平》手稿。